

纪念建国一周年时,学校要求每个同学糊一个五角形的、红色透明纸的灯笼,里面插上蜡烛,在国庆节的那天举着去天安门。那时很少有路灯,即使是大街上,稀稀落落的昏黄的路灯,其放光的范围也只有袖子那样大。我们的小手举着的五角星,灯光之微仿佛一只只萤火虫。等到了天安门,这些小萤火虫才汇入了灯的海洋。我对国庆一周年的记忆,只是无数小纸灯的光亮……

我们上课也有了新政治。比如图画课,几乎每个同学都画漫画,漫画就一个题材:胖胖的丘吉尔嘴里叼着雪茄烟,他的肩膀上站着社鲁门,翘着一络胡须,老丑而凶恶,拿着一个炸

【解放之初记事系列之二】

## 参与政治活动

□王学泰

弹向北朝鲜投去。他们的前面是一片火海与断壁残垣。那时根本不知道朝鲜在哪里,后来才懂得原来“朝鲜”就是住在旧家后街的(后河沿)与日本人杂居的韩国人的家乡,北平老太太称他们为“寒苦人”。

这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教会小学的反映。1951年,我上四年级时,学校动员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在前线苦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小学生也有捐献指标。小学生的钱是向家长要的,有的额外的则是从早点钱和零花钱中省出来的。后来高年级同学发明了一种找钱的好办法,就是从小铺里买点日常用品,然后零售给需要者,赚取其间的差价。我们几个小孩向家里各要2000元,凑成10000元(币制改革后的1元),买了一些桃形香碱(200元一块)和猪胰子(800元一块),然后走街串巷到各家去卖。香碱卖300元一块,500元两块,猪胰子卖1000元一块,并向顾客说明赚的钱是捐献飞机大炮的,我们不要。香碱,猪胰子这两样东西现在已经消失了,可是在六七十年前它们是普通百姓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四五个同学用盘子端着摆放整齐的香碱,猪胰子,在广安门大街两侧的小胡同里像大年三十晚上卖财神爷一样挨门挨户敲各家的门去推销。有的大人心疼小孩不容易,大冷天的手都冻僵了,就买一块,我们还向他们鞠躬致谢;但因为当时作这种“义卖”的学生很多,你去我来,人们早就烦了,有耐心的还说一句“我们买过了,你们去下家吧”,没耐心的,一听到敲门声,我们刚说了一句“请您买点香碱、香胰子,支援……”,腾的一声,门就开了,出来一位三四十岁的大婶,“去去去,没你们这么烦人的!”这种气势连李逵也得吓个跟头,本来就很胆怯的我们只能落荒而走。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宣传《婚姻法》。1950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婚姻法》,这大约是解放后颁布的第一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正式法律。“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法律都停止执行了,唯有《婚姻法》未停。海外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谑称“一部《婚姻法》治天下”。前年与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共同参与一个节目,吃饭闲聊时对她说起:“我在1951年还宣传过《婚姻法》呢。”李女士说:“那时我还没生呢,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她盛赞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在解放妇女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可是,当时作为宣传员的我们却很茫然。就连婚姻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小孩宣传《婚姻法》,真是匪夷所思。同学们发问:“老师,什么是婚姻呀?”老师回答很简单:“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就是婚姻。”我们还是不懂。

为了了解《婚姻法》,宣传之前每人发了一本小人书,这是解释《婚姻法》各个条款的。大家一条一条地阅读,不懂的可以问老师。我们读了,大多不懂,但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小孩的问题。《婚姻法》中的“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夫对于其妻所抚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或妻对于其夫所抚养与前妻所生的子女,不得虐待或歧视”,对这两个问题同学们提问最多,比如“什么是非婚生子”,“不是结了婚才有小孩吗”。小人书画着穿着婚纱的女人的旁边藏着一个胆怯的小孩,参加婚礼的人叫他“拖油瓶”,这些我们都不懂其意。老师翻来覆去解释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懂。这些问题直到上高中读小说时才弄明白。有个问题老师一解答,大家都懂了,就是关于“离婚”一章。好像小孩的潜意识中都有害怕父母离婚的因子,所以才发问:“老师,干吗准许夫妻离婚啊?”

“你们去听听《夫妻相骂》就懂了。”老师的回答言简意赅,又有现实依据。《夫妻相骂》是解放前夕和解放初在北京极流行的小调,连洋车夫,三轮车夫都会唱。它是调侃一对不和睦夫妻的,是男女二重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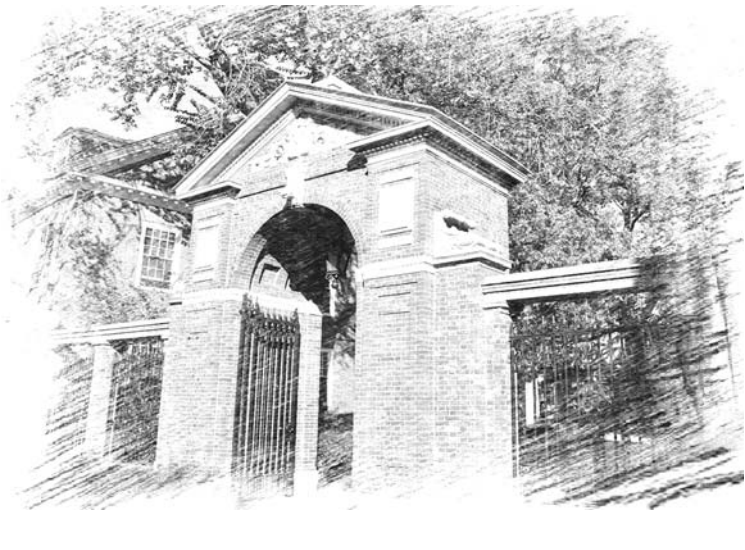
宣传《婚姻法》比卖香碱、香胰子捐献飞机大炮容易些。我们分组打着小旗,标明“宣传《婚姻法》”,那时北京人少,街道也比较宽绰,找个宽绰的地界,把人聚拢了,我们站在一个小凳上向观众读《婚姻法》。当然也有嘲笑的,说“这些小萝卜头懂什么”,大多还是认真听的,那时人们对于政府宣讲的东西还是十分尊重的。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域外走笔】

□张梦阳

他们如果讲求门面,什么样的超豪华大门都建得起。但是,哈佛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追求。



哈佛大学是世界著名学府,已有300多年历史,出了6位美国总统,32位诺贝尔奖得主。我对哈佛一直心向往之,渴望能够瞻仰它的校容,沐浴它的校风。心想,这所名校一定很堂皇,即使不像纽约那样矗立着摩天大楼,也一定是很现代、很富丽的。所以一到门口,就赶紧下了车。但是,进入我眼帘的竟是一座古旧、简朴的校门。红砖砌成,拱形的门洞,黑色铁制的大门,门框上面是三角形的尖顶。两边围墙也是红砖砌的,中间是陈旧的铁制护栏。

我简直惊住了,问导游:“这是哈佛大学的校门吗?”

导游有些不以为然地说:“当然是啦。”潜台词是:我还能领错了吗?

我禁不住又问:“是否还有其他的门?”

导游说:“这是历史上的旧门。周围还有很多门。”

我于是想,说不定还有新建的堂皇的大门,就向旁边走去。可是,周围的旁门依然是红砖、铁栅,依然很简朴。我被这种古旧和简朴惊呆了!

走进校园,依然是古朴的红砖楼

## 哈佛的校门

房,很敦实、安静,却并不华贵。校园也不大,仅相当于中国一所地区性学院。

这就是我久已向往的哈佛大学吗?是的。就是的。一点没错。我不禁想到了中国学校的校门。甭说大学,就是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门也比哈佛大学的壮观。据说有家地区级的大学花几千万元修建了一座超豪华的大门。后来,学校负责人辟谣说不是几千万元,而是300万元,还要起诉“造谣者”。其实,300万元也非小数,倘若用于教学或资助贫困学生,恐怕比建大门更有意义。问题还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办学的重心在哪里。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实践了它的校志

是。就是的。一点没错。我不禁想到了中国学校的校门。甭说大学,就是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门也比哈佛大学的壮观。据说有家地区级的大学花几千万元修建了一座超豪华的大门。后来,学校负责人辟谣说不是几千万元,而是300万元,还要起诉“造谣者”。其实,300万元也非小数,倘若用于教学或资助贫困学生,恐怕比建大门更有意义。

问题还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办学的重心在哪里。

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实践了它的校志

## 电视剧的两张不同面孔

【荧屏观澜】

□肖复兴

如果说《咱们结婚吧》是慢慢啜饮鸡尾酒之后温馨地递给我们一个痒痒挠,《老有所依》递给我们的则是一根带刺的荆棘。

肯定不是有意在打擂,但最近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和《老有所依》几乎同时播映,无形中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让观众有了各自的选择和评判,引导观众的心理反应的走向也不尽相同。

这是完全两种不同内容的电视剧,一边虽说是剩男剩女,毕竟还抓住了青春的尾巴,依然属于向青春致敬的靓丽面庞,虽然女神的脸上涂抹着过厚的粉底霜;一边则是老年人几乎是穷途末路、风烛残年的众生相,已经是满脸沧桑、皱纹纵横。一边即使是失业也仍然住着大房子、开着小汽车、喝着奶茶、过着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一边则是虽然有退休金却要为了看病、住房、再婚、空巢养老以及为儿女忧愁担心的底层生活。一边是打打闹闹、装傻充愣的恐惧恨嫁,却要装点得如同磨花水晶玻璃一般磕磕碰碰的谈情说爱;一边则是含泪带啼的粗糙得如同千疮百孔搓脚石的暮色晚景。一边以年轻人为主,也有老年人,却被凯丽、田岷和徐松子演绎成了半疯,属于明显夸张的戏剧表演;一边以老年人为主,也有年轻人,除了咪子演得分寸有点过,其余都还真实可信。

显然,内容的不同,戏剧构成的范式、导演的美学追求和表演风格的形式都不尽相同,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关注的焦点不同。《咱们结婚吧》关注的与其说是大龄男女的婚恋现象,不如说更为关注的是欲望都市里男欢女爱的杯水风波,调制的是一杯色彩明艳而可口的鸡尾酒。《老有所依》关注的则是中国越来越严重的老年化社会触目惊心的现实,那不能说的是一杯苦酒,起码不是泡沫喷涌的碳酸饮料,在不得不品尝之后,会免死狐悲地想想我们自己老了该如何面对同样的人生困境。如果说《咱们结婚吧》是慢慢啜饮鸡尾酒之后

温馨地递给我们一个痒痒挠,《老有所依》递给我们的则是一根带刺的荆棘。因此,一部轻松活泼,一部沉重苍凉,甚至有些压抑;一部拍成了轻喜剧,轻轻撩拨一池春水涟漪;一部拍成了纪实片,含芒带刺刺痛了我们敏感的神经,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作为大众文化中当今最受大众追捧的电视连续剧,从来都是大众心理的晴雨表。不能要求所有的电视剧都拍成抑郁凝重的现实片,轻喜剧甚至完全搞笑的喜剧也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只是,如今在电视屏幕中呈现的电视剧,样式过于单一,轻喜剧过多,谍战剧过多,婆婆妈妈的家庭剧过多,古装穿越剧过多,如《老有所依》这样向现实靠拢并有意针砭现实的电视剧实在太少。这样的电视剧的格局,实际上是我们当前大众文化乃至整个文化所呈现的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我们有意或无意的顾此失彼的选择,实际是在情不自禁甚至在喜不自禁地沿着一种回避现实的滑梯,舒舒服服并姿势优美地向一种虚拟甚至是粉饰娇饰的方向下滑,滑进入造泳池中的蘑菇池中,却以为是波光潋滟的大海。

我想起在19世纪巴黎曾经出现的艺术情景。那时,法国经历了1793年的大革命动荡之后,出现了经济复苏,尤其是都市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迅速地将过去的血腥变成了高脚杯里猩红的葡萄酒。由此,人们的心态和文化的表现都有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巴黎的歌剧就如同我们今天的电视剧一样时髦,其中两大类歌剧最为走俏:一类是以梅耶贝尔和奥柏为代表的大歌剧,讲究浮华的大场面、大制作、大题材;一类是以奥芬巴赫和古诺为代表的轻歌剧、喜歌剧,追求的是轻松和娱乐性。想想

铭:“促进知识并使之永存后代。”

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质量上还是分散在门面上,也关系到校风的培养。好的风尚应当是追求精神文化、学术、科学,而不是沉迷于物质享受和表面虚荣。据一位朋友说,哈佛人对科学、学术、文化、真理的追求到了“痴迷”的程度,简直不顾一切,而对物质生活要求却很低、很不讲究,吃穿都很随意,不放在心上。他们极其看重实实在在做学问的人,对浮华之徒则非常鄙视。哈佛大学累计已获捐292亿美元,这个数字使其稳居全美高校首富位置。他们如果讲求门面,什么样的超豪华大门都建得起。但是,哈佛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追求。内心充实的人是不必装饰虚华的外表的,只有那些内里空虚、没有货色又图虚名私利的人才热衷于虚张声势、造假做秀。而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一心只想着怎么享受、怎么摆谱这些形式上的东西,怎么可能沉潜于科学文化的实质性研究呢?

我从哈佛的校门,参观了它美好的校容,沐浴了它淳朴的校风,感受到它世界第一流的内蕴。

我在河北农村教书时结交的挚友汤吉夫先生,在其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学纪事》中,描写H大学某校长在盲目打造中国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狂热中,盲目扩建教学设施,在城市周边疯狂圈地,不仅滋生了建国以来罕见的高校领导、博导校长的腐败大案,而且弄虚作假的“申博”风、“门面”工程等等,也极大地败坏了以教书育人为宗旨的高校教育风气。某些学校的所作所为,正是当前中国一些大学真实状况的缩影。与哈佛的校门相对照,岂不令这些大学负责人汗颜,令国人反思?

鲁迅先生毕生力主翻译的《中国人气质》一书,重点批评了中国人注重面子、不顾实质的国民性弱点。100多年过去了,这些弱点不是仍然在某些方面作祟吗?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如今我们的电影,难道不也是所谓大片和贺岁搞笑片这两种走俏吗?在这样的文化潮流裹挟下,电视剧出现的对现实回避而一味轻喜剧化的现象,不过是电影的翻版而已,甚至比电影更甚。面对从政治时代到经济时代同样的历史转型期,艺术和现实的规律与表现,我们竟然无师自通而和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如此惊人相似,实在是值得警醒的。

我赞赏赵宝刚,在轻车熟路导演了一系列青春轻喜剧饱受好评之后,他明智地选择了直面现实的老年题材《老有所依》,他有意地褪去了青春脸上的脂粉和腮红,而把追光落在老人苍凉的脸庞上。几乎是路径相反,刘江在导演了比《老有所依》更要直面现实的《岁月》受到挫折之后,他迷途知返,聪明而迅速地改弦更张,转向了轻喜剧,替青春即将逝去的男女脸上重施一道彩妆,企望遮盖岁月曾经的风霜。

我不能说一个是有意的转身,一个是无奈的屈从,我只能说,在大众文化的潮流中,电视剧想在潮头挺立是不容易的,不同的选择有各自不同的道理,轻松娱乐不是什么错,奥芬巴赫和古诺依然是法国著名的音乐家。只不过,这样都想出新却各自寻求不同出口的转折充满悖论。想起法国学者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中曾经一针见血说过的话:“大众艺术出新的一点,在于它预见到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得到‘自我’补偿,见到此加以利用。”其实,自我补偿可以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和途径,市场不是唯一,电视剧的收视率不是唯一。有眼光、有抱负、有艺术追求的导演,面对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是屈从迎合他们,还是引导提升他们,关乎着电视剧乃至大众文化未来的发展。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